

■他山之石

# 作为社会科学的考古学

——《如何探究史前史》简介

陈淳

近日,加拿大考古学家布鲁斯·特里格的《如何探究史前史》(Beyond History: The Methods of Prehistory)中译本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在我国,史前学大体与考古学同义。英国史前学家柴尔德将考古学看作是分辨、发掘、记录和保存历史资料的实践,而将解释称为“将过去拼合起来”,需要用理论方法对材料做系统和综合的研究。特里格将考古学看作是一门采用各种技能提取和整理物质遗存的实践性学科,而史前学则是用考古材料来重建历史或提供阐释性综述。因此,材料整理和阐释工作分属两个不同层次的研究。

20世纪上半叶是考古材料的积累阶段,绝大部分学者的主要精力集中在整理区域材料和构建年代学的工作上,解释的任务还没有提上议事日程。像柴尔德这样运用考古材料重建欧洲文明发展史,并将摩尔根文化进化论与埃及和近东材料相结合,提出宏观历史综述的学者实在是绝无仅有。

20世纪中叶,欧美考古学的范式转变不是针对田野技术,而是阐释方法,特别是针对“为何”的规律性问题。过程考古学批评传统研究单凭归纳的常识性解释,提倡假设—演绎的科学解释。认为结论如要被采信,就必须接受实证的检验。目前,我国考古学的主要实践仍然是发掘和整理材料,尚未将它们有效转换成与文献有别的历史知识,而常见的解释仍是材料的归纳或未经检验的个人观点。所以,这本书对于如何进行阐释很有帮助。史前考古学的根本目的是要为人類历史和社会发展提供洞见,否则这门学科仍是依赖新发现和新材料的技术操作,很难为其他学科提供见地独到的学术参考。因此,如何将无言的物质遗存变成置信度较高的历史综述,是增强这门学科科学性的关键所在。

## 梗概

考古学传统方法的优势是把材料在时空上安排得井然有序。但是材料的解释受到霍克斯推论难度阶梯的制约,即复原技术和经济比较容易,复原社会结构较难,复原宗教信仰最难。即使史前学家能够充分掌握各种材料,常常也无法确定文化变迁的原因。这有赖于对年代学更加详尽的控制以及对周围文化历史更加详尽的了解,同时也有赖于对民族志材料和社会人类学理论的了解和熟练运用。解释社会变迁构成了史前学的理论领域,这种综述能力不同于田野考古学家所掌握的一套技能,但和后者一样重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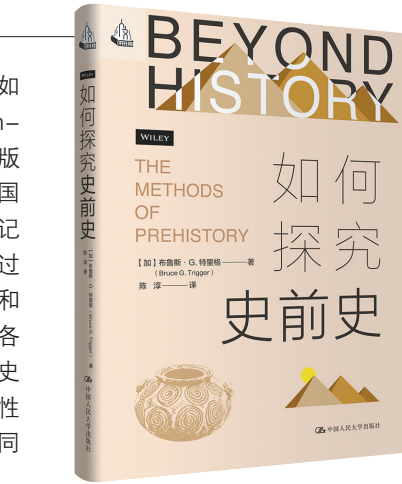
重建史前史需要采取学科交叉,在提取和整合各种材料和信息的基础上,用社会科学理论指导来做出尝试性解释,并根据理论、方法和实践的进展而不断完善。田野发掘和材料整理是一种经验性操作,一般熟练技工都能胜任。而阐释则是一种科学研究,需要以问题导向来收集和分析材料,并用逻辑推理构建证据链,从而得出因果关系的初步结论。这需要我们将摆脱当前分类描述和科技考古两张皮的困境,各学科的专家为解决某些重要问题共同商讨研究的策略。这种科学探索需要建立一套与田野发掘和材料整理迥异的思维和探索方式。这种策略包括概念、变量、模型(假设)和理论等基本要素。

**概念**  
阐释通过概念来表达,用精确的名字称呼事物,是理解的开始。概念很容易混淆,关联也不可靠。屡见不鲜的是,相同的术语有不同的含义,术语与实践之间也存在矛盾。因此,定义明晰的概念是解释和交流的基本前提。本书首先说明历史学、考古学和史前学的区别以及史前研究的方法。然后从人类学角度强调了将族群、语言和文化等概念作为独立变量加以讨论的重要性。作者还讨论了一些常易混淆的术语如文明、城市和国家,认为似是而非的概念和残缺不全的证据严重制约了考古学透物见人的解释工作。

**模型**  
考古学探索就像历史侦探,目的在于弄清现象背后的潜因。这种科学方法是有别于材料归纳的演绎,需要提出不同假设以供检验,这种尝试性解释被称为模型。由于史前研究不是实验性科学,加上残缺不全的考古材料,学者只能根据当下最充分的证据和最佳理论来作出解释,并要根据新材料的积累和理论方法的进展而不断修正,甚至推倒重来。尝试性解释以提出各种“模型”为特点,比如分析和解释社会功能运转的“系统论”是一种机械式模型,而塞维斯探索社会演变规律的“游群、部落、酋邦、国家”则是一种进化论模型。

**变量**  
变量是一物之名,并是一类特殊的概念。各种概念通过变量的关联来提供解释。在考古学解释中,一种误导的观念是认为族群、文化和语言之间的差异是同分化过程的产物,于是认为某群人的历史可以拼凑不同材料来重建。然而许多反例证明,族群、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必须作为独立的变量来研究。

**文化与社会**  
对不熟悉民族志材料的学者常会将文化与社会相提并论,或将社会看作文化的表征,习用一些器物或墓葬来推断生计、亲属关系和社会结构。然而,社会是人际关系的网络,而物质文化是



人类活动之产物,而且是历史重建非常有限的依据。由于不同的器物或工具因其功能差异具有不同的流通和传播方式,因此没有一种以器物组合划分的考古学文化能够等同于某个社会单位,文化与社会单位的边界极少重合。考古学文化无法以任何机械的方式与诸如部落或国家等社会单位相对应。

**传播迁移论**  
考古学一度非常流行采用传播迁移论来解释文化变迁,即将新发现材料与已知文化的比较来追溯其渊源。但是,在运用这种理论来解释考古材料时,常常会流于简单粗糙。虽然传播是指思想的扩散,而迁移指人群的流动。但是实际情况要复杂得多。比如,人群扩散却没有文化传播(维京人移居北美),迁移是传播的主因(西班牙人征服墨西哥),没有人群移动的传播(拉丁文化随罗马帝国的扩张),人群迁移而没有文化传播(移民的同化)。因此,传播与迁移是独立的概念,需要分别对待。在判断文化关系时,我们还必须留意文化特征的功能趋同或独立发明。小到石器和陶器,大到农业、金字塔和原子弹,我们可以找到很多趋同和独立发明的例子。

**社会变迁**  
考古学的社会变迁研究主要是从聚落形态、跨文化类比、器物类型、装饰母题以及语言学材料来分辨亲属关系和居住方式。其最大问题就是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将民族学与考古学材料之间画等号。另一个重要议题就是社会复杂化,有些重要的术语用法混乱,比如“文明”“国家”和“城市”常常互换。其实,文明是指技术和文化艺术发展的较高水平,国家是权力制度化的社会,而城市是一种聚落形态。厘清这三个概念,能让我们较准确地把握复杂社会的不同方面。国家往往是文明发展的先决条件,但有些早期文明如古埃及和古典玛雅并没有城市,而有的城市如麦加与国家形成无关。

**理论**  
理论旨在以某种规律性方式说明事件和现象的因果关系,并因问题具体或抽象的特点而有不同的层次。没有理论,社会科学就会沦为没有条理和毫无意义的一堆材料和数据。在解释中,我们应该把个人观点和科学假设区分开来。本书介绍了国家起源或社会融合的两理论,一是“有机”团结,将技术和经济看作促成社会凝聚的主动动力。二是“单方”或“机械”团结,把武力征服看作是主动动力。早期国家起源也有其他不同的理论,比如自发论、水源论、冲突论、贸易论和生态系统论等,它们都通过变量动态关系的模型来提供解释。

最后,作者利用考古学、地质学、语言学、图像学、体质人类学和神话等材料对埃及前王朝的社会发展进行了综述。特里格认为,解释社会变迁必须立足于对人类行为的充分了解,重视这门学科与其他社会科学,特别是文化人类学之间的关系。采取一种不同学科证据之间对话的形式,并用社会科学理论来作出解释。

## 启示

一百年前,西学东渐进入中国的考古学是地层学发掘的田野技术和材料整理的类型学方法。由于本土化适应和学术定位,使得上古史材料借助文献资料来解释,而史前材料的解释基本凭借直觉和常识的判断,并不擅长采用文化人类学理论和实证手段来探讨现象背后的原因,对各种不同观点加以论证,并权衡某种结论的置信度。因此,我国考古研究的阐释层次亟待提升。一方面,考古学是研究人类自身的一门学科,因为它具有其他学科难以企及的长时段视野,因为处于社会科学或人文科学的核心地位。另一方面,由于材料的物质性和不完整及阐释的各种难度,使得它被认为是所有历史科学中最难研究的领域。考古学从材料积累转向历史重建,需要从发掘和采样开始就有解决问题的意识,并采取多学科交叉、通力合作,共同解决文化变迁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战略性课题。

完善和提高考古学课程可以为人类历史作出更大贡献,也能极大提高这门学科的地位。而《如何探究史前史》可以为培养这种能力提供一条门径。

(作者单位:复旦大学文物与博物馆学系)  
**《如何探究史前史》**  
作者:[加]布鲁斯·特里格(Bruce G.Trigger)  
译者:陈淳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8月

■新书共赏

# 填补空白 嘉惠学林

——《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集成》序

齐东方

“何家村遗宝”的名字很响亮,至少在文博考古界家喻户晓。因为这是一次重大考古发现,出土文物是一个族群,有金、银、铜、玻璃、玛瑙、矿物等质地的各种器物近千件,数量大、种类多、品级高、制作精美、保存完好,都是以往的发现无法比拟的。作为唐代文物的精华,这批遗宝一经发现,便遨游世界,传递着中国古老文化的信息。

何家村的发现为什么如此重要?可比较两个世界宝藏。1877年中亚阿姆河流域,发现一批珍贵的金银器和钱币,具有波斯、大夏、斯基泰、希腊等多种文化的特征,学术意义重大,被称为“阿姆河遗宝”。可惜确切的出土地点不明,又经商人几次转手,混进其他的物品。何家村窖藏文物的种类和数量更多,其中有明确来自波斯萨珊、东罗马、中亚粟特和日本等地的物品,不仅可与“阿姆河遗宝”媲美,而且出土地点清楚、埋藏年代比较明确,显示出更为重要的学术价值。考古发现的唐代窖藏很多,但何家村如此罕见,使用通常的窖藏名称,实在有些委屈,用“遗宝”取代“窖藏”,名副其实。

另一个是日本正仓院宝藏。正仓原本是日本古代保管国家田租正税、政府财物的仓库,随历史演变,绝大多数正仓不复存在,奈良东大寺正仓院由于保存皇家珍宝,一直延续到现在,闻名于世。东大寺正仓院皇家珍宝的来源,是圣武天皇去世后,在七七忌日,即天平胜宝八年(756)六月二十一日,光明皇太后为祈福,将先帝生前珍贵的宝物奉献于东大寺供养所舍那佛。其后不久,又四次奉献于卢舍那佛皇室珍贵物品。这些宝物中,有许多是当时遣唐使、留学生、僧人等从中国带到日本的,是唐代最精美的文物。何家村的发现,添补了以往中国藏品的某些缺憾,又增加一些比正仓院宝物更为精彩的实例。

唐朝手工艺究竟创造了些什么?其成就在文献中有描述,文辞虽然优美,理解起来却很茫然,当看到实物才会豁然开朗。何家村遗宝正是一大批古色古香的珍宝,展示着大唐盛世创意和激情,以及唐人快乐的生活、惊奇的发明、精妙的艺术、森严的等级、文化的融合,从发现至今,给人带来的不仅是惊奇、震撼,还引发了一连串的事件、故事,也成为20世纪中国的文化事件。很多学者都在尝试解读器物携带的文化密码、谜团,试图发现辉煌背后藏匿的生活的诗、历史的故事。

可惜的是,这是1970年的一次偶然发现,

未经科学发掘,当时没能做更多的记录整理,丧失了很多信息。

幸运的是,这批遗宝保存基本完好,没有散失,如今仍保存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中。

遗憾的是,这批遗宝至今也没有全部展出,也没有一部完整的考古报告。

回溯过去,何家村遗宝发现后的首次亮相,是1971年在北京故宫举办的“全国出土文物珍品展”上,但只公开了鸳鸯莲瓣纹金碗、鎏金舞马衔杯纹银壶、金筐宝钿团花纹金杯、八曲银杯、八棱银杯、鹦鹉纹提梁银罐、五足银熏炉、镂空银香囊、6条金走龙、嵌金玉臂环、玛瑙兽首杯和几枚金银货币。《文物》1972年第1期复刊号上,刊登了何家村窖藏发现的简报,文字不足5页,黑白照片。1973年5月8日,携带着何家村部分文物的“出土文物珍品展”第一次迈出国门,在法国巴黎珀蒂宫隆重开幕,此后这个展览先后在16个国家和地区巡回展出。

何家村遗宝引起国内、国际的巨大轰动。此后,凡有关于中国精品文物或唐代主题的文物展览,几乎必选何家村遗宝。毫不夸张地说,讲到唐代物质文化成就,一定要讲何家村遗宝。只有看到这些器物,才能知道唐代具有什么样的魅力,什么样的精彩,什么样的情趣。何家村遗宝,成为唐代形象的代言。

又过了30年,何家村遗宝没有随时间的流逝被淡忘,反而越来越引人关注。2003年北京大学赛克勒考古艺术博物馆10周年庆典,作为特殊的“贺礼”,在国家文物局特批下,陕西历史博物馆和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联合举办了“再现盛世辉煌——何家村遗宝特展”。配合这个专题特展,出版了《花舞大唐春——何家村遗宝精粹》,这本书是对何家村遗宝的一次学术重新“发掘”。新拍摄的照片尽可能有各个角度和细部,每件器物都有详细的描述,提供了准确的数据。然而也只选择了73件(组)精品标本。2010年,陕西历史博物馆推出“大唐遗宝——何家村窖藏出土文物展”,也并非遗宝的全部面貌。

何家村遗宝,是划时代的考古大发现,对遗宝的学术研究广泛而持久。50多年来,学者们从考古学、历史学、美术学、宗教学、机械学、医学等各个方面的讨论、探索一直延续至



今。但是研究者长期看不到全面、系统、完整的资料,只能依靠一些零星的器物进行探索,影响了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入。

具有如此重要学术价值的发现,需要有详细的报告,这一功在千秋的工作,如今终于由陕西历史博物馆侯宇彬、谭前学先生等组织编写的《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集成》一书完成了。这本书参照考古发掘报告的编写体例,按照器物材质分类编排,全面系统介绍了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全部何家村遗宝,也尽可能多地提供了器物的局部和细节,填补了何家村遗宝长期以来没有发掘报告的空白,对理解、探讨、阐发器物的历史背景和文化内涵有极大帮助,具有重要而独特的学术价值。不少业外人士常抱怨考古报告很枯燥,甚至无法阅读。其实不然,就像破案,需要真实、准确、客观证据,然后才是判案。又像患病,需要有各种检查、化验等数据,是医生判断的重要依据。《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集成》提供了更丰富、更广阔、更翔实的资料,为以后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考古报告的重要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时隔半个世纪,当年直接参与清理何家村遗宝的前辈学者陈吴镇烽先生外都已故去,如今由后辈学者排除万难,重新仔细整理编写,可谓薪火相传,生生不息,在此必须向所有参与编撰的学人表示敬意。

我曾在《花舞大唐春——解读何家村遗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7月)书中说过:何家村遗宝的主人是谁?精美的器物来自哪里?何时被埋入地下?为什么要埋入地下?那些器物的历史价值和意义是什么?……一连串的问题仍旧困扰着学界,一个个尝试解读也接踵而来。然而,目不暇接的解读,引起的困惑比答案更多。

随着《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集成》的出版,相信以后的研究会更上一个台阶。

**《西安何家村唐代窖藏文物集成》**编者:陕西历史博物馆  
出版社:陕西人民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9月

# 展望中国神话考古的广阔前景

——《汉代东王公图像研究》

霍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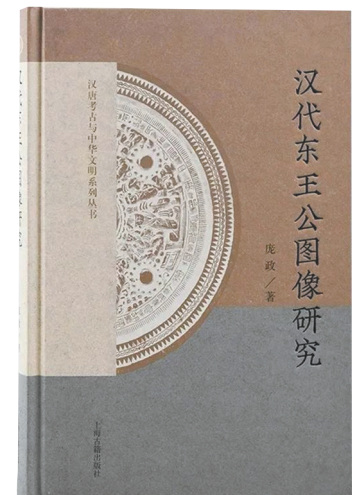
庞政博士的著作《汉代东王公图像研究》一书嘱我写序,这我不禁想到近年来中国考古学研究中一个重要的领域——神话考古。如果仅从狭义的考古学去理解,“神话”和“考古”这两者之间完全是两个截然不同的范畴,神话虚无缥缈,考古讲究实证,似乎很难把两者扯到一块儿。但事实上,在出土和传世的考古材料中,有很大一部分都与神话传说有关。阅读前人的著作,我甚至认为,将神话考古作为一个研究领域,也未尝不能成立。

史前时代考古,除了建立考古年代学框架和区分类型学体系之外,近年来人们越来越重视对于中国早期思想意识、宗教观念与原始文明基本内涵、神灵与祭祀内容的探讨,如河南濮阳西水坡仰韶时代出土的蚌塑龙虎图像,其文化内涵就相当丰富,冯时先生认为这是体现出远古人类“观象授时”的遗存,很有道理。同时,也可以推测,在距今6500年前远古先民的观念形态当中,如龙、虎这类神灵动物,尤其是龙的构建,已经包含了大量远古的神话因素。只是这些神话有的流传下来了,有的则已经消失。当我们面对这些考古出土材料时,就需要具备这种眼光,从不同的层面去加以认知和阐释。

进入到历史时期考古,我们更是要接触到许多与中国古代神话有关的考古材料,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个神话体系更为庞杂,中国本土的神灵,西方传来的神灵,有时还交融融合为一体,以更为丰富的面貌出现在文献记载和考古实物当中。例如,庞政博士这部著作当中所涉及的东王公图像,就是一个神话体系中的“大神”,只是过去更多的研究者是从宗教学或者从美术考古的角度来看待他的。

庞政的这部著作特点比较突出。首先,他从考古资料的收集、整理和年代排比的工作入手,将目前考古所见到的东王公(也包括西王母)图像作了系统的梳理。从流行地域和相关年代这一时、空关系框架上,确定了研究对象的考古学背景,从而使得整个研究工作不是零散的,仅仅对个别材料的观察和阐释,而是具有一定时段、较为广阔空间的考古学考察。这体现了考古研究的基本原则:一是要拿足够多的材料来说话(或至少有几分材料说几分话);二是对这些材料加以整理之后,可以看出其中的时、空体系和源流演变。

另一个我特别要推崇的特点,是本书合理地利用了传世文献材料。将考古图像材料和文献材料相互结合,观察东王公图像的原



流演变,并且将其尽可能地放置到“原生状态”中去加以考察,从而能够前人之所未发,形成自己独到的见解,这是尤其难能可贵的。

庞政在书中总结归纳出东王公图像的几个重要特征及其背后的历史意义和价值:第一,是东王公和战国秦汉以来逐渐流行的昆仑、蓬莱两大神话体系之间的关系。庞政认为,两汉时期,东王公与蓬莱神话的联系尚未明确建立,成熟期的东王公基本还是西王母的“镜像”。东汉晚期以来,东王公逐渐开始脱离西王母信仰,谋求独立神格与地位的

提升,最终在道教等力量的推动下与东海蓬莱仙境相结合,治于海中蓬莱仙山之上。第二,东王公之所以从发展流变上看经历了从与西王母的结合,到脱离西王母而独立,并与蓬莱仙山相结合的过程,从时空节点上观察正处于汉末魏晋时期,而这个时期正是蓬莱神仙信仰再度复兴之际,图像的兴起与这一思潮之间有所关联。第三,东王公脱离西王母而独立,并与蓬莱神仙信仰的结合,既推动了蓬莱神仙信仰的复兴,也进一步促进了东王公独立神格和地位的获取,两者相辅相成。

这些观点是否能够最终被学术界所接受,可以在未来接受更多学者的学术检验,但我认为,这种求实创新的探索精神,是值得肯定的。

在我的学生当中,受我的影响,王煜曾经较为集中地关注和讨论过昆仑神话系统及其反映在考古材料中的诸多问题,发表过一系列的论著。庞政则更加专注于对蓬莱神话的研究。他们两人的博士论文,也都是围绕这两大神话系统的考古学研究展开的。庞政的这部新作,可以视为对这一研究领域的进一步拓展。

我之所以同意他们去关注和研究这些看上去似乎并不那么“正宗正脉考古”的题目,源于我从内心深处一直以来就认为,无论是中国的考古还是外国的考古,只要是值得研究的问题,这些问题本身也涉及历史发展进程中的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神这些重大的话题,考古学为何要自设藩篱,自己跟自己过不去?

**《汉代东王公图像研究》**作者:庞政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3年8月